



当代科学文化前沿丛书

HIGHER SUPERSTITION

高级迷信

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

第二版

*The Academic Left and Its
Quarrels With Science
Second Edition*

[美] 保罗·R·格罗斯 著
诺曼·莱维特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当代科学文化前沿丛书

HIGHER SUPERSTI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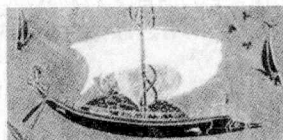
高级迷信

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

第二版

*The Academic Left and Its
Quarrels With Science
Second Edition*

[美] 保罗·R·格罗斯 ①著
诺曼·莱维特 ①著
孙雍君 张锦志 ①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6-045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第二版)/(美)格罗斯,莱维特著;孙雍君,张锦志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

(当代科学文化前沿丛书)

ISBN 978-7-301-14165-6

I. 高… II. ①格… ②莱… ③孙… ④张… III. ①科学学-研究 ②伪科学-批判 IV. G301 N0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23729号

This is a translation of Higher Superstition: The Academic left and Its Quarrels with Science © 1994, 1998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Maryland.

书 名: 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

著作责任者:[美]保罗·R.格罗斯 诺曼·莱维特 著 孙雍君 张锦志 译

丛书策划:周雁翎

丛书主持:韩文君

责任编辑:韩文君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4165-6/G·2436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zyl@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1.5印张 305千字

2008年9月第1版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2.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译者前言

《高级迷信》一书中译本要和读者见面了。作为译者,有三句关于本书的话要向其读者申明——

首先,这是科学家阵营奋起对各种“科学批评”展开反批评的开山之作。

自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领域兴起后,尤其是随着国内学界所谓“广义 STS 研究”的发展及影响的深入,围绕科学事业而展开的各种研究进路逐渐向世人呈现出某种整体风貌,并汇聚成被国外学者称做“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的“统一战线”;其所给出的各色研究结论,在科学家看来,都属于“科学批评”(science-critique)之列。公允言之,科学批评的兴起与发展,呼应的正是人类欲全面理解科学事业的愿望与诉求:科学事业对人类发展及福祉的影响毕竟太重要了,只有在全面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驾驭科学技术并使之成为人类造福。所以,才会有众多学者挺身而出,从哲学角度解说科学何以可靠、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从社会学角度解说科学事业应如何组织发展、如何评价激励,从心理学角度解说科学创新何以可能如何实现,从法学角度解说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利益应如何分配,从经济学角度解说应如何评价科技事业的投入与产出,从伦理学角度解说科技发展与价值观变迁间的关系,从文化角度解说两种文化之争、少数民族的权利、“科学霸权”的形成与影响……

但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这些“解说员”从身份上看大致都属于“非科学家”之列;即使偶有具备科学训练背景的学者,如卡尔纳普、库恩等,人们对他们的认识也主要是凭借其“科学批评”言论,而非通过其科学成就。这就带来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科学批评”家们作为“局外人”对科学事业的认识结论,能否代表作为“局内人”的科学家们的意见?换言之,众多“科学批评”言论是否具备合理性?“外行人”对科学事业的指手画脚究竟

是切中了时弊，还是哗众取宠隔靴搔痒？要想给出这类问题的答案，不能单凭“科学批评”家们一家之言，至少也要听听科学界的意见。可惜长期以来，一直缺乏来自科学界的反批评声音。而这本由美国生物化学家格罗斯与数学家莱维特共同撰写的著作，正是科学界对各种“科学批评”展开反批评的开山之作。

为什么由这两位作者的这一部著作首先“揭竿而起”，其中也许有太多的偶然因素，但观诸上世纪末的“科学大战”（Science War）中的代表人物及论战文字，不论出自科学家阵营还是非科学家阵营，都要提到本书及其两位作者的观点，就可看出本书所给出的反批评意见的深刻，以及影响之深远。就以已时过境迁的“科学大战”而言，今天的人们若想反思这场论战何以发生何以不可避免，后世的人们若想评价这一切，都绕不开《高级迷信》一书。

本书也是首次将各种“科学批评”的视角与观点集结在一起“示众”的宣传画廊。后现代主义、社会建构论、女性主义、深层生态主义、文化批评等思潮，近年来都有较丰富的“科学批评”成果问世，其社会影响亦颇有蒸蒸日上之势。但按照贯穿其间的某种思想脉络将这一切串起来的尝试，以笔者视域而言，本书尚属首次。

其次，这是一本将深刻性与可读性较完美统一起来的著作。概言之，有三个特点：

思想严肃而不刻板。科学家与本书所谓“学术左派”之争，其实质是否真如某些学者认为的是“两种文化”之争的最新翻版，或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两大阵营争夺有限学术资源和话语主导权的表现，且搁置勿论；但其中的确涉及许多严肃而又深刻的学术问题：如何看待科学的价值与社会功能？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精髓是什么？科学权威的来源与合理性何在？本书作者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也是严肃而又深刻的，其忧患意识与悲天悯人的情怀随处可掬，但又不让人有丝毫呆板说教面目可憎之感，令读者能时时体验到如高手过招般的从容和理智愉悦。

立论严谨而不中庸。本书两位作者用自然科学训练所培养出的严谨思路来处理他们所欲讨论的问题，从提出问题到立论解答，皆有坚实的事实作基础；同时立论决不恪守中庸之道，反而畅快淋漓直抒胸臆，招招见血。这种锋芒，对于那些早已习惯了四平八稳不偏不倚不痛不痒以

至于不知所云的“批评”风格的中国读者来说,无疑会有种格外的痛快与亲切感。本书的引入,在某种程度上将成为国内学术争鸣方法的新范本。

文风锐盛而不凌人。本书在风格上属于论战文字,有咄咄逼人的气息自在情理之中,但作者在处理“对事”与“对人”的关系上,却表现得相当高妙:对事则铁面无情,对人却处处留有余地。学术的繁荣离不开争鸣,但观诸国内近年来的学界,争鸣不是没有,但要么不温不火不知所云,要么盛气凌人乃至“凌身”,总之是分不开“事”与“人”的关系。本书的引入,在如何进行学术争鸣方面可为国内同行树立某种新的典范,因为诚如作者所云,“我们论战的对象不是敌人,而是自己的朋友。”

最后,这是一本稍嫌“过时”但绝未“过气”的著作。

说它稍嫌“过时”,是因为该书在美国最初出版于1994年,至今已逾14年。在善于跟风、赶时髦者的眼里,这本书无疑早已“过时”。但国内学界最令人惋惜、痛心处,恰恰是这种跟风、赶时髦现象。

改革开放后,中国学界要在“废墟”上崛起,首先面对的是与“五四”前辈们相同的问题,即如何“睁开眼睛看世界”。为了迎头赶上,当时的学界前辈必须首先了解国外同行都在研究什么、研究到了何种程度,由此确立了跟风、赶时髦的合理性。在出版界,也就有了“三个面向丛书”问世并取得广泛社会反响的理由。经十年之功,这步任务已基本完成。换言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学界就应转向“自主创新”阶段。但历史的惯性,再加上经济改革思路对学界的影响,使这种跟风式“范式”并未在其理应终结的时候顺利更新;直至上世纪末,来自政治家的“创新”号召才使学界普遍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如何创新?很难说清,但赶时髦的风气、“短平快”的科研管理模式、急功近利的学术心态,无疑是创新的大忌。创新,最起码需要点“十年磨一剑”的平和与从容。本书从1998年开始动手翻译,至今年得以面世,整整十年。陈述这一事实,并非要凸现译者治学的从容心态(敏锐的读者当不难从中窥见其疏懒之性),而是想表明:作为代表中国出版界较高水平的北京大学出版社,能不以时髦为尚,把这样一本已略嫌“过时”的著作推出,正体现出其对目前中国学界思想发展脉搏的准确把握。

在举国上下竞相谈论“科技创新”如何重要的形势下,更应在理性上对科学事业有全面而清醒的认识。相对这一任务目标而言,代表科学家阵

4 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

营声音的《高级迷信》一书远未“过气”，相反倒正是助产中国学界在“科学研究”领域的深邃洞见的“它山之石”。

孙雍君

2008年5月12日于泽丰苑

第二版前言

与大部分科学家、工程师和数学家——其中也包括那些创立了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并赞助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人们——一样，我们一向都十分重视有关科学与科学史的社会分析（social analysis），现在也依然如此。至于反科学（anti-science），则不过是我们文化中一个历史极为久远的话题，如果只是那些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货色，根本就激不起我们针对它进行研究与著述的冲动。之所以撰写《高级迷信》一书，是因为我们两人虽然工作在各不相同的大学里，但都从各自独立而又极为相似的经验中感觉到：某种令人不安的新东西已悄然渗透到学术命脉之中，并进而在大学讲坛、专业期刊、学术著作以及教员间的闲谈中扩散开来，这就是对现代科学的蓄意诋毁。时代在呼唤着一种公开的回答。但即使是最无聊的科学批评，一旦披上诸如社会分析、诠释学（hermeneutics）或者“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的外衣，就可以公然招摇过市。对于我们目前在学界屡见不鲜的反科学谬论和破绽百出的伪学问，不论是作为个体的科学家们，还是各种科学团体，甚至就连被诋毁学科领域内的学者们，都不曾流露过丝毫要据理驳斥的意向（难道这还需要什么胆识不成？）。我们不知道自己殚精竭虑所撰写的著作究竟会引发怎样的反响，事实上，我们内心里十分惶恐，因为本书的讨论只能摇摆于粗线条的理论论证和技术细节之间，摇摆于意气之争和理性分析之间，故很容易落入从新版到库存积压，再到削价处理的境地，直至最终淡出人们的记忆，激不起任何涟漪。

但事实却证明这种惶恐并无根据：出乎意料的众多支持者和反对者们迅速在年会、研讨会、期刊和互联网上针对本书发表了看法，使我们心头的愁云就此消散，但也把我们卷入了由此引发的风暴中心。可以清楚预见的是，在洋洋大观的各色评论中，绝大多数来自科学家阵营的论者都持有强烈的赞成态度，而绝大多数敌对见解都来自“科学批评”（science-critique）的学术小圈子及其盟友。然而有趣的是，部分敌意最浓的评论却出现在隶

属于科学共同体的期刊上，这些期刊将自己的版面出让（他们总是时不时地要这样做）给那些反科学和伪社会学的奇谈怪论的辩护士，而此类奇谈怪论却正是本书所批判的靶子。这些评论在部分立论保守的期刊上备受推崇，尽管我们已承诺放弃为保守派政治理想以及任何政治纲领推波助澜的企图。绝大多数愤激性评论都来自于被我们称做“学术左派”（因这一称谓而来的误解屡屡发生）的小圈子，他们极力想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本书的两位作者是病人膏肓的保守主义者（不过却掩饰起了本来面目或诸如此类），从事的是反动的勾当，还怀有维护个人既有的丰厚研究基金的鬼胎。

事实上，在我们撰写此书时，那种历史地潜伏在保守主义底蕴中的对科学的本能憎恶，基本上尚处于蛰伏状态。但自那时起，它又以新“达尔文主义”（这并不意味着左派中不存在反达尔文主义）的控诉的形式，再度呈现出聒噪喧天之势。因此，假如我们可以重新撰写此书，“学术右派”（academic right）的尊号就会在副标题中与学术左派赫然并列，而且会有专门的一章来论述“花样翻新的目的论”。的确，“右”与“左”在这些问题上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比如说对于特创论教条——按照其“正宗美国版”的说法——极左的身份政治拥护者和极右的《圣经》正统辩护者同样都能安之若素。就我们所知，至少就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科研共同体成员——一位在很多方面都很时髦的极左派人士——曾经为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学校董事会辩护过，认为他们有权在学校的科学课上讲授神创论。显然，在她（一位我们在第一版中未曾提及的知名学者）看来，与“自然科学所获得的有关自然的真理独立于社会—文化因素之外”之类的观点相比，宗教信仰侵入科学课堂一事根本就算不上什么问题。

然而，在我们看来，这类让人惊诧的事件却是相当有趣的。其中最有意思的案例，当推因艾伦·索克尔（Alan Sokal）那篇恶作剧文章的发表而引发的国际性闹剧，该文题为《跨越边界：通向量子引力的变换解释学》，发表在时髦期刊《社会文本》（*Social Text*）上，如今早已是声名卓著了。索克尔的玩笑至今仍被纷纷传扬着，其意义也是多层面的，而这一玩笑正是索克尔在阅读本著的过程中引发的。起初，作为一位有原则的左派人士，索克尔也曾疑心本书的两位作者是众手所指的保守主义者，在维护科学的借口下实际上却从事着阻挠自由主义进程的勾当。但他最终发现，本著的大部分观点都有令人信服的论据，事实上，索克尔本人在进一步研究之后，确信我们在某些方面对反科学情形的估计远为不足。本著以清晰的证据

显示,激进的持不同政见者们那曾经生机勃勃的理智传统,正逐步沦落为一种反智势力,这一事实使索克尔极为沮丧,促使他于1994年秋暂时把物理学放在一边,花费了数周的时间去炮制其游戏之作。这篇煞有介事的文章在当年的初冬季节被提交给《社会文本》。当时的索克尔懵然不知的是,该杂志——由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详见第四章)领导——正筹划出版一期冠以“科学大战”(the science wars)名目的专刊,其目的就是要为所谓后建构主义的、文化多元论的以及女权主义的科学批评辩护,并公开驳斥针对上述种种批评的批评者,特别是格罗斯和莱维特两位堕落分子。由于索克尔的文章附和了编辑的意图,且奉承的意味十足,便理所当然地被编辑选中了。

这一期有污点的刊物如期出版了(1996年5月),索克尔揭示其恶作剧谜底的文字于数日后在《共同语》(*Lingua Franca*)上被公之于众,接下来一切都失去了控制。可以预见的是,某些保守主义者幸灾乐祸地跳了出来,大肆宣扬“索克尔文本”事件,认为这进一步证明了左翼支持者都只不过是些彻头彻尾的白痴(尽管索克尔本人坚持的正是极左派立场)。但对于学术界来说,更耐人寻味且在某种程度上更有意义的,却是大多数左派知识分子对此的反应。近年来,人们对后现代理论的故作艰深,对往往与之相伴而行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华而不实,已积聚了越来越深的反感情绪,索克尔的恶作剧恰好把这种反感引发出来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那些长期以来在“进步”圈子的政治辩论中独霸话语权且言辞尖刻的名流们,突然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令人尴尬的处境。而针对拙著的反控诉声浪,亦未尝露出丝毫息止的迹象。

在这一新版本中,我们本期望能把索克尔论文的全文作为附录收录进来,因为该文以极富戏剧性的效果,逐字引证了一大批后现代主义者论述科学的“经典之作”及其迥来的哲学观点。可惜,由于某些人的脆弱情感的介入,这一期望未能实现。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教授领导下的杜克大学出版社作为《社会文本》的出版者,当然也拥有索克尔文章的版权。该学术团体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的重印申请函的回复,附带着一份只能被称为天价的版税声明,所提供的理由是:他们认为——该声明如此解释——约翰·霍普金斯出版社会在这笔交易中赚进大把的钞票,因此他们理应索取应得的份额。然而,据我们所耳闻的可靠消息,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态度,其主要原因是出于怨怼,而不是基于利润的考虑。无论真相究竟如何,我们都只能向读者们致以深深的歉意。索克尔那篇具有重大价

值的游戏之作，读者们只能到别的地方去查阅原文了。

本书所引发的广泛关注，坚定了我们把这一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的决心，于是便在纽约科学院的赞助下组织了一次研讨会。这次研讨会于1995年春在纽约召开，名为“对科学与理性的背叛”（*The Flight from Science and Reason*）。有数十位学者和作家——给他们冠上“著名的”字样我们决不会感到脸红——出席了会议。此次研讨会所取得的成就至少证明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因为相对主义和反理性主义（*antirationalism*）的泛滥——或者，说得更露骨些，是因为在特定的知识分子团体内部，对于辩护逻辑、证明以及理智的思考正越来越缺乏耐心——而产生的疑虑，并非自我本位的科学家们狭隘的杞人忧天。与会者们所隶属的谱系极宽的政治观点和学术领域足以证明，“对理性与科学的蔑视正日渐增长”的主张，并非保守主义者们为了寻找诬蔑左派的借口而无端编造出来的耸人听闻之言。这次研讨会的论文集如今已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重版发行，并补充收入了许多实际会期之后征集到的论文，从而大大拓展了其主题与论点所覆盖的范围。关于这次研讨会，别的且不论，单是其涉及范围之广，在我们这一崇尚精细专业化的时代，就的确令人感到惊讶（至少令我们这两位组织者感到惊讶）。除此之外，哪里还会有这样的出版物，在单单一册的容量里，既能找到有关如何筹备出版《李尔王》（*King Lear*）之编辑体例的滔滔雄辩，另一方面又能发现有关“量子论对于我们的物质实在观的寓意”的旁征博引的论述？

就在该论文集出版之际，所谓的“科学大战”（尽管我们并不喜欢这一术语，但作为新短语它已经客观地存在于世了）正如火如荼地全面展开，索克尔事件只不过是一个显见的刺激因素。凭借其自己量身订制的*认识论装备，激进的“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一直沾沾自喜于其可免受严肃挑战与批评的特殊免疫力。然而，这种免疫力已开始逐渐消解，因为已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注意到：建构主义历史学家、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以及女权主义认识论者所散布的关于科学的误解，如今已达到了怎样的广度和深度！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包括：针对杰拉尔德·盖森（*Gerald Geison*）的著作《路易·巴斯德的私有科学》（*The Private Science of*

* 原文为“do-it-yourselfer”，直译为“（业余爱好者等）自制的，为业余爱好者使用或装配而设计的”。联系上下文语境，作者是想借此对“科学研究”实践者们在认识论上缺乏统一规范的现状，表达某种嘲讽甚至蔑视的情绪。——译者注

Louis Pasteur), 诺贝尔奖获得者佩鲁茨(M. F. Perutz)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著文加以批驳, 以及接踵发生的类似事件; 索克尔的讽喻之作也催生出一大批相关文献, 包括出自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之手的评论, 同样发表在《纽约书评》上, 以及哲学家保罗·鲍豪森(Paul Boghossian)发表在《时代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的评论。至于“科学研究”组织内部, 在如何回应这些批评的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有的阵营誓言要捍卫相对主义的绝对真理地位, 并郑重宣称一切科学知识都逃不脱朝生夕灭的命运, 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 当推历史学家保罗·弗曼(Paul Forman)和文学理论家巴巴拉·赫恩斯坦·史密斯(Barbara Herrnstein Smith)。另一方面, 某些狂乱的信号已经显示, 部分曾一度信奉正统的“科学是一种社会习俗”观的信徒已认识到: 该适时地从如今已过时的先锋位置后撤了。“没有人会相信那种观点”之类的争辩时不时地在媒体上爆发, 花样不断翻新且火药味十足, 其实不过是面子之争罢了。诺顿·怀斯(M. Norton Wise)已经给出了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模式标本。但遗憾的是, 这类争辩终究无补于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 总会有另类文字不断披诸报端, 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 某位在“科学研究”舞台上极为著名的人士恰恰相信过那种观点。

这些问题如今在精英云集的学术机构也得到了回应。举例而言, 斯坦福大学就从其“科学研究”计划中找出了严重的问题。更令人注目的是位于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等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那可是这个国家里云集名人最多的研究机构, 同时也是相关争论一直最为激烈的地方。我们当时尚不知道, 就在本著完成之前不久, 该院内部曾爆发过一次激烈的冲突, 为的是“科学人类学家”布鲁诺·拉都尔(Bruno Latour, 参见第三章)被社会科学系提名为其永久成员一事。该院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们, 由于对拉都尔的著作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 所以一下子闹翻了天, 迫使该提案只能不了了之。我们自己在撰写有关拉都尔的评论时, 对这些事件尚一无所知。事实上, 由于该研究院的缄默, 关于这次纷争的流言直到事过境迁将近一年之后, 才随着《高级迷信》一书的出版而流传开来。最近(就在过去的数周之内), 同一问题又在同一个地方再度爆发: 诺顿·怀斯, 普林斯顿的一位科学文化史家, 被提名就任该院曾一度拒绝授予拉都尔的职位, 但同样被否决了。读过怀斯关于本著和《对科学与理性的背叛》的书评[分别发表在《艾西斯》(*Isis*)和《美国科学家》(*American Scien-*

tist)上]的读者,可能都会理解:为什么我们两人并不像某些社会科学评论员们所说的那样,都理应为这一事件而感到特别沮丧。该事件作为众多相关迹象之一,标志着科学家和数学家们已开始逐渐醒悟:在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科学研究”领域的某些领先人物所撰写和教授的,究竟是怎样一些货色。

如今,对这次大辩论或斗争做出反应的研讨会、讲习班,以及大量涌现的印刷品,在美国以及整个西欧都随处可见——只有就这种意义而言,“科学大战”这一轻率的说法才有其合理性。对于那种以“文化建构主义”(cultural constructivism)面目出现的理性虚无主义,许多著名的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长期以来一直都抱有深深的疑虑。但由于害怕被扣上“胆小鬼”的帽子,害怕被看成过分软弱而不敢投身于激动人心的斗争的“认识论懦夫”,他们迟迟没有提出质疑。如常所见,他们被学术圈子里那些致命的指控——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性别歧视、蔑视异己,等等——所带来的恐吓震慑住了。再者说,在公开介入涉及专业的论战之前,诚实的学者们往往需要投入足够的时间进行艰苦的探索,并且,他们还必须确信自己的行为不是无的放矢。无论如何,他们当中的部分人如今终于摆出了战斗的姿态。最近一段时间里,那些曾被吹捧得很高的先锋派“科学研究”作品正经受着有条理的周密审查,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下的缺陷,并不仅仅是由荒谬的哲学假设导致的,还包括方法论上的失误以及严重的史实错误。作为这一新姿态的明证,我们可援引《沙滩上的房子》(*A House Built on Sand*)为据,这是一本由类似批判文字汇编而成的读物,即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如果《高级迷信》的出版对这些反击行为起到了某种程度的催化作用,那就是我们撰写本著的最大满足。

下面简要交代一下本版所作的删改和补充。在基本思想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我们修正了原文中的一些印刷错误以及少许欠妥的措辞,个别虽无关紧要但与实事稍有出入的地方也得到了纠正。在一些博识的读者的启发下,我们对某些论点又有了新的认识,这些内容都已在新增的一组“补充注释”中阐明。增补的注释中也录入了某些学者就部分案例深入研究所获得的证据,与最初考察时相比,这些研究结论强化了我们所选案例的意义。此外,还补充了为数不多的几条相关新证据。

在这一新版本的准备过程中,诺曼·莱维特曾受惠于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的个人研究项目资助计划,保罗·R·格罗斯凭借埃丝特与约瑟夫·克林根斯坦基金(Esther A. and Joseph Klingenstein Fund)

提供的一笔津贴,得到到纽约科学院进行访问,对这一给予本书及其相关科研项目的支持,我们深表感激。最后,本书两位作者向道格拉斯·阿玛托(Douglas Armato)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的全体同仁致以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为这版平装本的及时印发所提供的专业帮助。

致 谢

下列朋友和同事曾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鼎力襄助,令我们不胜感激。他们都读过、听过或与笔者讨论过至少其中的部分章节,并在提出批评意见的同时,表达了对本书的谬赏——唯褒贬程度不同。我们对任何人的建议都未曾全盘接受,但对所有建议都酌情予以了采纳。在这里要特别感谢那些向我们提供资料的朋友,他们不惮其烦地指出了为笔者所忽视的实例和线索,在百忙中仍慨然向我们贡献出自己已发表和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以及很有可能被我们疏忽的文献。我们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深怀谢意,该社社长和工作人员自始至终所表现出的灵活性与学术严谨性,正体现着人们对一个大学出版社所寄予的、也是理应寄予的厚望。对于玛丽·布兰切特(Marie Blanchard)和特里·舒茨(Terry Schutz)两位编辑,我们的感激之情更是无以言表。

作为一家之言,本书指出了针对学术与学术成就的种种威胁。我们至今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我们的同事对本书各稿的普遍反应却认为,至少就目前情况而言,这种威胁还远构不成严重的危害。本书具体内容在事实、立论与风格上的不当之处,当然与下列诸君没有丝毫关系,只能由作者文责自负。相反,大量此类失误之所以能得以避免,完全是得益于他们所慷慨贡献的真知灼见,他们是:Tony Bahri, Felix Browder, Ralph Cohen, Eric Davidson, Robin Fox, Sheldon Goldstein, Wendy Gross, Antoni Kosinski, Steven Levitt, Martin Lewis, Eve Menger, R. L. Norman, Bernard Ortiz de Montellano, Philip Pauly, Christopher Phillips, R. K. Ramazani, Eugenie Scott, Keith Spurgeon, E. O. Wilson,以及 Joe Wisnovsky。

有必要申明的是,之所以要列出笔者各自所属大学的名称,只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我们在本书中所采取的立场是纯个人的,与我们为教学或行政目的而从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所大学或学术机构都没有丝毫干系。

目 录

第一章 学术左派与科学	1
学术左派	3
愤慨何由而来	5
褊狭性	8
必要的辨析	10
答辩状的设计	14
第二章 历史与政治因素考辨 ——自然科学及其天敌	18
破迷与执迷	26
对美国左派历史的简要回顾	31
敌人的面目	37
第三章 文化建构论的文化建构	48
弱形式的文化建构论	50
强形式的文化建构论——作为约定的科学	51
作为权力的科学	57
解释	63
作为权力斗争的科学	65
富豪统治者们	72
作为政治编码的文化建构论	79
第四章 瞎话王国 ——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和 文化批评	81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	82
硬把科学当做隐喻	88

目 录

“理论”在政治上的诱惑性	95
哲学的复仇	99
文化研究:对理性的逃避	102
混沌理论简介	106
关于混沌的谬论 1:史蒂文·贝斯特	109
关于混沌的谬论 2:凯瑟琳·黑黎斯	113
第五章 应运而生的社会性别	123
女性主义的胜利	124
当今的性别歧视	127
女性主义代数学	130
单倍体的解释学	134
珍视卵细胞	138
关于性特征的舆论导向	141
整治物理学	145
科学与“科学研究”	151
“辩护”策略	154
论自然	157
无法逃避的语境	163
第六章 伊甸园之门	170
环境保护的现实方面	178
三种态度	183
理性的禁忌	184
“狼来了!”	189
公认的观点	192
瑞弗金的信条	194